

不做时代的落伍者



韩雅兰复旦大学毕业照

今天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韩雅兰家庭条件优越，名校毕业，却背着父母偷偷跑到延安上了抗大。尽管抗大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她却感到很开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追求。

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此点终不能安心。

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儿听了也万分凄惨。大人平时最知儿之心情，也最疼爱儿的，这点儿早已深知，同时也是儿一往对家庭留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那年玉妹被捕之事发生^①，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到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时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那时儿接读信后，难过了几天，想想我们真有点对不住父

^① 指写信人的弟媳杨玉珊，她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被捕。当时因为写信人的弟弟在国外上学不在家，其父得知这个消息后，抛下全家老小，孤身一人，连年节都不过了，赶往南京、上海，企图设法营救，但未果。

母之爱。此后儿是时刻都不会忘记父亲痛心的话。然而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时又被感情支配着，这极痛苦大人是不会了解的。谁料前年又遭受圣域这样的侮辱^①。为了不让使大人难过，为了孩子的问题，忍耐一切痛苦到现在。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亲爱的慈祥的父亲母亲，假如儿没有大人的疼爱 and 体贴，假如没有求得一点不受人欺侮的知识，那儿现在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圣域他固然给了我苦头吃，然而他也毁灭了他自己。儿想，他所受的损失或者比儿还要大呢。儿已受够了痛苦，人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自己毁灭自己。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的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请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钧儒^②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决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地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总之，儿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说的，儿现在所走的爱国的路，想必能得社会人士的谅解的。恳祈大人恕儿不告之罪，而仍以从前的爱儿之心来爱儿，则儿幸甚。

这里^③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的多。什么话都可讲，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没有不对这里发

① 此处指 1935 年写信人的丈夫纳妾之事。

② 指 1936 年 11 月 23 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之事，史称“七君子事件”。

③ 这里指陕北延安和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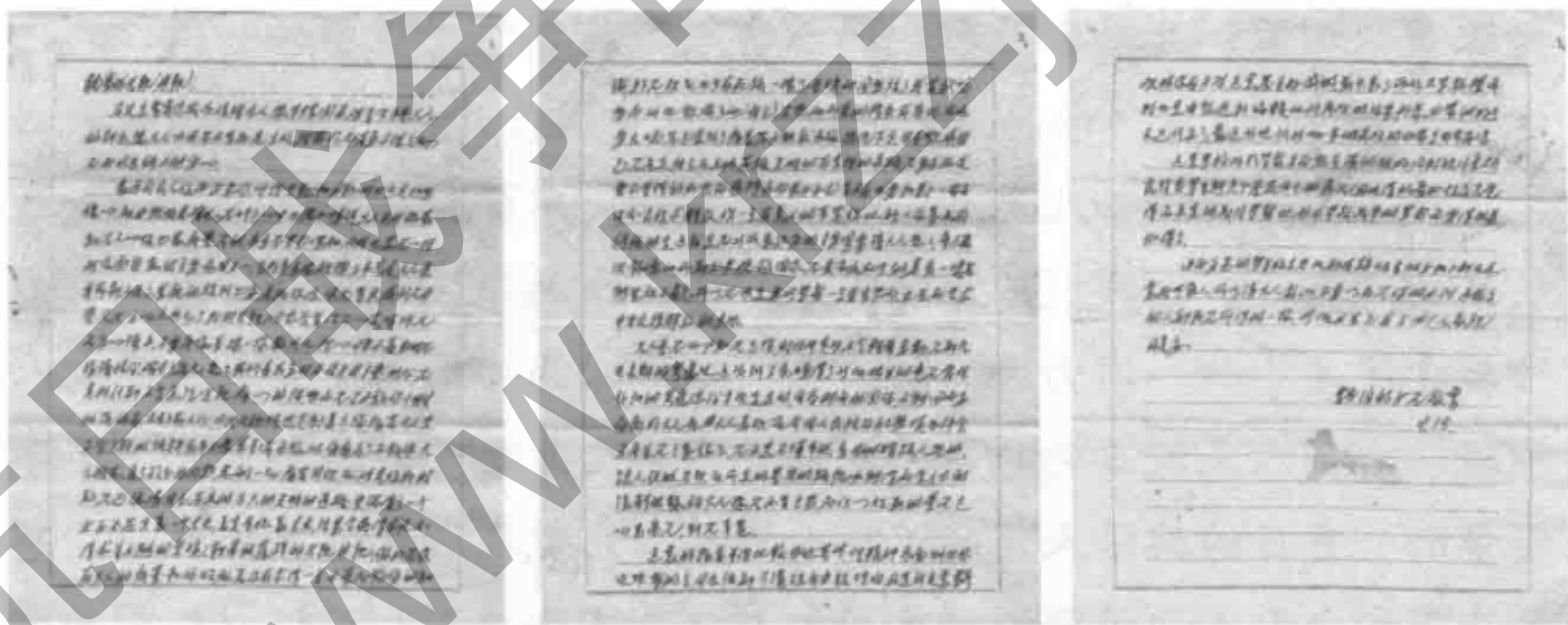
生好感的。前天来了两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申报》周刊编辑，他们参观的结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经走了。最近外边到此地来的参观的非常多，时常有人来。

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的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儿觉得在这里的几个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

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①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作的不对。这样多的人都和儿所作的一样，此地的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
健安

漂泊的女儿^② 敬稟

4.18



- ① 赵师长，指杨虎城部 38 军第 17 师师长赵寿山。抗战期间，原杨部被改编为 38 军和 96 军，赵任 38 军军长。1941 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赵成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等职。1965 年 6 月，因病去世。其女指赵铭锦，当时她也在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学习，抗大毕业后，由罗瑞卿等介绍入党，组织血花剧团派往杨部 38 军工作，后入学校学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医生。其子指赵元介，抗大毕业，长期从事戏曲教育工作。
- ② 因为写信人是在延安，信要寄往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所以没有署名。写信人从 1930 年离家到上海，在外多年，后由于丈夫纳妾，她有家不能回，所以这里给父母写信就署了个“漂泊的女儿”。



背景链接

这封家书是我母亲从陕北延安写给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时间是1937年4月18日。

我的母亲叫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3月与我父亲一起赴上海，后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母亲从复旦大学毕业，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二期学习，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我母亲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母亲走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到延安后虽曾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回信。她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便让父母谅解、放心。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母亲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



韩蒲之父、韩雅兰和韩蒲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西安



韩望尘和女儿韩雅兰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上海

运动。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终年38岁。

母亲自我3岁时就离开了我，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再加上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作为地下党员，根据党的组织纪律，她不可能把所从事的工作、担任的职务告诉我这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因此我对于母亲的情况基本不太了解。母亲去世后，由我外祖父和舅舅在西安南郊买了一块墓地安葬。

1957年夏，因为公社化，村里要收回母亲的墓地，我赶回西安，把母亲的棺木迁往南郊

三兆公墓（“文革”中许多墓被平，母亲的墓现在也找不到了）。因为要填写墓穴申请单，问了家里人及母亲生前的朋友，才知道母亲的具体生辰并且听说母亲当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安市妇委委员。

这封信母亲生前没给我看过，母亲去世后，外祖母把母亲的遗物交我保管。我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封信，6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作为纪念。2010年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正在收集民间家书，我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再把这封信长期保留在我的手边，捐给博物馆也许可给后来的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有所帮助。

我的外祖父名叫韩望尘，外祖母名叫原蕙。外祖父生于1888年，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了陕西的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在于右任靖国军总部工作，后到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工作。从这时起，他与杨虎城结成莫逆之交，协助杨部的巩固和发展。



韩雅兰（中）和弟弟韩钝初、弟媳杨玉珊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上海

西安事变期间，他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离陕并被关押，杨部遭受迫害，他不避危险，亲身参与处理善后事宜。他拒绝国民党为其恢复



陕西妇女界代表与丁玲（着军装者）合影，丁玲后右后方为韩雅兰，抗战初期摄于西安

党籍，出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与杜斌丞、杨明轩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划和建立工作，担任总支部财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先后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长。1971年9月21日因患脑血栓而逝，享年83岁。

信中提到的玉妹是指我母亲的弟媳，即我的舅母杨玉珊。她1904年生于蒲城。20年代入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女师中共第一届支部委员。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末赴日本留学。1930年初，因参加中共与日共在东京举行的“银座暴动”，被日本警方逮捕，后被驱逐出境，返回上海。此后，她进入复旦大学教育系读书，同时在中共沪西区工委领导下，深入工厂，做女工工作。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出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西安的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如为《西北妇女》撰写抗敌支前的文章，同时在西安作秀女中、长安县中、临潼县中任英语教员。1947年重新入党，回到党的队伍中来。

（韩蒲口述，孙思怡记录整理）